

重振乡村教育 实现乡村振兴

张文明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摘要:“乡村振兴”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乡村振兴策略期望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教育是一个核心要素。教育的振兴与发展可以给乡村带来“留下来的希望”,也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词:乡村教育;制度安排;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8)86-0005-03

1 近年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大力度的普及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国民识字率已有很大提高,当下,中国人口识字率已达95%以上,大多数国民业已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习。根据唐启明对于中国学生教育机会的获得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获得率及所受到的教育年限上均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点证明,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机会获得呈现增长趋势,流动机制也日益活跃。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在农村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这一次布局调整由于主要的措施是将农村小规模的内教学点予以撤并,在乡镇范围内设立中心校,因而又被学者们简称为“撤点并校”。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撤点并校程度已经达到了从“村村有小学”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小学总数量已由2000年的接近60万所锐减至2012年时的25万余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这一变化大致上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网点下移”和“多种形式办学”的政策;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撤点并校”的政策。对于这两个政策,笔者将在下文进行梳理,并对“文字下乡”和“文字上移”两个概念的解释力作出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是农村教

育综合改革。这一改革以大教育的视角,改变农村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首先提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该工程被视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向农村拓展的标志;同时,在乡村统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强调教育与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农科教三结合),以“燎原计划”、“星火计划”为支撑,促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农村寄宿制学校和乡村中心校的普遍建设,出现留守儿童就学县城聚集现象,城市流动儿童的大量增加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设立。其中,国家在农村最重大的教育实践莫过于撤点并校。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下,中国农村小学的数量由1997年的51余万所减少到2006年的29万多所;教学点从1997年的18余万个减少到2006年的6676万多个。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中国改变了“村村有小学”的面貌,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学校消失,有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了“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这一机制不仅带来了农村家庭的变化,亦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层面的转型。这种城市与农村的教育不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的。那么问题是:那些基本属于城市又远离农村的流动人群的下一代如何确保其受教育的公平性?

种种研究表明,这一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流动人口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也出现了极大的流动性。农村儿童的升学过程可能随着父母流动而跨越城乡多地的教育空间。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的统计显示,进城上学的农民工随迁子女

收稿日期:2018-06-08

作者简介:张文明,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内生发展与大都市郊区农村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

的比率正在不断逼近留守率。另一方面,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比例在慢慢增长,但大城市严控外来人口的政策使得城市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受到明显挤压(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由于多地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大幅提高,可以推断出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由于在城市读书的条件更加严苛或者成本越来越高,而选择中途回到老家就读。实际上,城市中的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的政策对于广大的农民工阶层尚难以受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

2 制度安排与教育市场化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认为,将社会保险作为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条件脱离了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实际,在笔者的调查中就发现不少务工人员需要付出各种“非正式支出”来办齐各类证件。另外,在小孩入学以后,学校会给家长发放“家校联系册”,要求家长检查孩子的作业、参与家长会以及家校活动,学校对家长参与子女学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或工作时间较长、本身学历不高缺乏文化资本,从而对子女教育的参与能力有限。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市场化带来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随着政府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以此作为城市的教育资源的补充,许多私立幼儿园以及小学开始建立起来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产生了办学质量的分化:优质私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两极对立的局面。城市中的优质私立学校不仅学费昂贵,而且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十分高。家长为小孩能够进入优质私立学校,需要让孩子学习多种文化技能,以便在入学考试中获得优势,而且这些学校还以要求家长的全方位参与闻名于家长界。城市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小孩不仅与优质私立学校无缘,当成绩不稳定时,其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从而较少地享受到教育市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补课)。调查显示,私立学校的学生可能异质性更大,既有本地小孩,又有随迁子女,既有收入较高的外地人,又有住在附近的本地人。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出身于低收入的农民工阶层。

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冲击甚至已经蔓延到县城、乡镇地区。笔者发现,农村学校在下午4点多放学之后,学生若不参加补习班就会有很多的闲散时间,

在监管人是慈爱的爷爷奶奶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作业草草了事,所以对于不少家长而言,课后上补习班是托管孩子的一种方式。值得指出的是,乡镇地区的这种形式的“辅导班”(以放学后辅导小孩做作业而开设的班级)也会出现大班额的现象,辅导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就意味着农村的家庭用自己的血汗钱购买了质量较低的教育服务。

一旦放学后的孩子或者住在寄宿学校的孩子拥有更多空闲的时间而没有家长监管时,他们会聚在一起玩游戏甚至去乡镇的网吧等场所。总而言之,种种因素在影响着农村儿童的入学机会、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习条件。

3 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城乡融合。但是,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过程还存在着现实的壁垒——流动人口的身份是障碍的关键。对此,有很多学者认为需要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从政策意味来理解,客观上这种过程是身份的转变,但是如果从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来看,实际上这种转变在中国却有极其复杂的制度障碍。如前所述,在人类世界中,随着城市作为一个“资本霸权”出现之后,相应的产生了一系列“人的权利的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国短暂的高速发展中尤其剧烈。其表现形式是:作为城市内的“流动人口”,他们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城市”也无法回到“乡村”——即使是最为基本的“下一代”期盼也无法实现。

3.1 乡村“撤点并校”:成为阶层固化的一个引发机制

“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背景对于学生教育资源的获得,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的影响得以扩大化。这是因为,正如上面分析的,“撤点并校”过程之中国家将部分压力转嫁给家庭的同时,也意味着教育获得的选择权被交给了家庭——而此时家庭的先赋条件就对于子女的入学学校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了。因此,从子女整个受教育历程来看,“撤点并校”在前期增大的家庭经济成本在后期转变为间接地参与到“阶层再生”的进程之中来,它使得农村学生的教育获得进一步受到结构的限制,减少了下层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在城市务工并且定居能力较弱的流动人口

家庭,父母的工作可能不稳定,而且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子女的学习中(而家校合作这也是当下学校所推崇的),甚至亲子陪伴的时间也很少。不少流动儿童在迁学的过程中需要多次适应新环境,这对他们的学业成绩产生了潜在的危害。值得深思的是,虽然当下的升学考试还是以应试的形式为主,但是不少优质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招收学生时不仅需要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考察其综合素质,所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帮助其子女积累的更多的文化资本,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认可。文化资本分布结构具有阶层的不平等特性,这种先赋的差距是否会通过学校系统进一步扩大为更严重的不平等呢?

3.2 城乡分割:教育获得使得不均衡与不充分矛盾加剧

有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据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在农村教学点日益减少、相对优质的乡镇中心校聚集之后,农村里“租房陪读”的模式开始兴起。在中国家庭中,就养育模式而论,拥有较高和较低文化资本的家庭具有显著不同的养育模式,养育模式的分化同样在当下的农村进行:按照农村家庭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层次,其小孩的就读地点分别可能是留存的村小、乡镇中心小学、县城小学甚至大城市的学校,也正是由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家庭经济情况不甚稳定,小孩转校的次数比较频繁。值得探讨的是,农村家长是“主动投入”还是“被动卷入”?最新的一项关于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的调查发现:陪读一方面原因是家长不愿意让年龄较小的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种

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家庭策略,为此他们也承担了更高的成本——包括租房等直接成本和无法就业获得收入等机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撤点并校”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农村地区带来的“空心化”等后果已逐渐被国家认识到,教育部在2012年已下发文件,坚决制止进一步的基础教育学校撤并的行动。这意味着,这一过程已然成为历史。然而,尽管如此,它对于农村个体的教育机会和家庭经济安排以及农村社会的巨大改变确是已然并将继续影响中国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选取这样一个成为历史的政策变动的讨论,在将来可能会更好地理解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分层形式。

众所周知,城乡关系从竞争走向融合的过程是解决人为造就的社会分层走向平等的过程,其历程正是对市民权的再造过程,而对“人”的尊重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变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解决“留住人”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张丽萍. 中国社会发展统计概览[C].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 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Treiman, Donald J.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45(3), 3-25. doi:10.2753/CSA2162-0555450301.
- [3] 熊春文. 再论“文字上移”: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近期观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
- [4] 杨东平,王帅. 从网点下伸、多种形式办学到撤点并校——徘徊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3, 34.

Revitalize Rural Education, Rejuvenate Rural Areas

ZHANG Wenm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Province 200062, China)

Abstract: Rural 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 core strateg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new-era China.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aims to handle the issue of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cy for rur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core problem lies in educati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an bring lasting hopes for weakening rural areas, as well as motiv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ural vitalization